

长平:

社会运动在中国：无花的春天

各位下午好！

昨天我刚刚从纽约回来，在那里我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简称CSW）召开第59届年会，也参加了抗议中国政府的集会。

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成果文件审议，是本次年会的重要主题。北京会议是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政府为此感到骄傲。在3月9日的开幕式上，中国政府代表宋秀岩宣布，今年9月，中国政府将与联合国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

然而，就在这个会议召开前夕，也是“三八”妇女节前夕，北京、广州、杭州、云南等地多名女权活动人士被警方带走。随后，李麦子、韦婷婷、王曼、郑楚然及武嵘嵘等五人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打压异议人士的“寻衅滋事”。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抓捕行动。2015年3月6日之前，中国历史上唯一公开打压女权运动的政府，是1912年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政府。袁世凯政府镇压了伴随辛亥革命出现的争取女子选举权运动。

她们干了什么呢？她们原计划在节日期间进行公交车反性骚扰活动。地铁、公交车上的性骚扰，是中国女性面临的严重问题，官方也不否认。在此之前，这些女权活动人士多次进行反性骚扰活动。

但是，官方不能容忍有组织性的民间抗议运动，哪怕只是反对性骚扰。

更重要的是，性骚扰的严重来自女权运动的不张。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国策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女权运动。而习近平的中国梦，其实是一个父权帝国梦。他让媒体称他为含有父亲意味的习大大——要知道，在中国，得不到最高领导人本人许可，没有人可以给他取外号。

这位父亲威风八面。自他执政以来，官方媒体反复宣称，针对西方式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主张，“关键时刻要敢于亮剑”。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网络发言危险重重，倡导公民权利的NGO新公民运动、传知行、立人图书馆、亿人平等社会组织被纷纷摧毁，异议人士被重判入狱。

在此之前，中国社会运动一直存在“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争论。很多NGO人士希望当局相信，建设公民社会不仅不会危害政权，而且可以帮助政府解决问

题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政治反对者认为，在一个垄断一切权力的专制政府之下，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公民社会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民主运动。习近平显然更认同后者，看到了公民社会运动对于政权的威胁。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差点再次让人们燃起“去政治化”运动的希望。那就是知名媒体人、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问题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今年全国“两会”之前，这部纪录片在网络发布，一周之内，据称超过三亿人观看，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很多人认为，就像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引发的环境运动一样，《穹顶之下》将会让中国社会达成治理雾霾的共识。

这部纪录片详尽地揭示了，中国环境问题在症结在于中石油和中石化“两桶油”的垄断。中国高级官员在影片篇中承认，“中间的每一个环节，基本都是一个垄断环节”，“垄断是不可能创新的”，“外界的人士滴水不进”，“就是一个独生子，这个玩具都是他的，他可以玩得很腻，他可以乱扔”。垄断导致行政失灵，法制无效。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难发现，用这些话来描述中共政权本身更加合适。中国的环境雾霾背后是更加严重的政治雾霾。为了能够发布与传播，纪录片回避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且呼吁给予环保部门更大的权力。这种妥协引发了激烈的批评，有人认为它和权力同流合污。支持者认为，社会运动必须与官方妥协甚至配合。

一周以后，官方下令禁止传播和讨论这部纪录片，并从网络删除。人们期待的社会运动没有发生，甚至“两会”也没有太多的讨论。中国的三月，在《穹顶之下》如焰火闪烁之后，比“寂静的春天”还要寂静。

并非所有的抗议活动都不允许发生。众所周知，官方不仅允许，而且会暗中组织反日游行，派人到香港进行反占中示威活动等。还有一些活动，也许并非官方组织，但是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

2015年开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济南、沈阳、浙江东阳、南京等多个城市，出租车司机先后罢工。多家媒体刊发消息，新华社还发表了长篇报道。新华社报道说，近年来，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先后出现出租车罢工事件，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所有这些报道都不提“罢工”，而是把它叫做“停运”。

中国宪法里写着公民有游行和言论自由，但事实上游行从来不批准、言论遭严格审查。而罢工，连宪法里都不被允许。1982年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利的理由是，中国是公有制国家，不会发生罢工。然而，吊诡的是，宪法允许的游行示威被严厉禁止，出租车行业的罢工却得到允许，出租车司机甚至可以和政府谈判。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出租车行业的罢工对政府无害，甚至可以维护其利益。出租车行业是高度垄断的特许经营。跟任何垄断行业一样，政府部门或者官

员都跟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公司有着深厚的利益关联。一辆出租车的营运牌照在上海可以达到五六十万元。

出租车司机罢工通常有两大诉求，一是降低“份子钱”，二是打击“黑车”。前者几乎没有实现过，但是政府部门协同出租车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涨价转嫁风险让消费者买单。后者等于在进入垄断行业之后，要求政府保护壁垒，维护垄断机制，在这一点上，所有从垄断体制得到好处的，出租车公司、司机及政府部门，均为利益一致者。

当然，政府的可疑角色并不能否认出租车司机的罢工权利。事实上，在政府、出租车公司及出租车司机的关系中，政府占据生死予夺的地位，随时可以翻脸。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罢工之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与出租车代表进行了亲切的座谈。不久后，前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作为“黑社会”头目被抓，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组织了重庆“11·3”出租车罢工。

在每年的全国及地方“两会”上，妇女及儿童权益、环境治理和劳工权利，都会出现不少的议题，甚至成为舆论焦点。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人大政协连橡皮图章都算不上了。诸多重大政策，都是党代会决定宣布。

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每年“两会”，都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从事社会运动和观察的人，会感到北京的春天越来越寒冷和灰暗。在浓厚的政治雾霾中，社会运动以前是只开花不结果，如今连花的不让开了。

谢谢大家！

讲座在讨论研讨会“民主与中国的劳工运动” 2015年3月21日, Bochum。